

※ 香港經學研究專輯 ※

「香港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吳儀鳳*

一、前言

由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和新亞研究所主辦、浸會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和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協辦的「香港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於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至七日，分別在香港浸會大學逸夫校園逸夫行政樓五樓會議廳（SWT 501 室）和香港九龍土瓜灣農圃道六號新亞中學禮堂舉行。

由於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以香港經學為主體召開的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因此不但受到香港學界的關注，也獲得香港之外，尤其是臺灣學術社群的熱烈參與。兩天的會議，共有三十二位學者提交了三十一篇論文，分成七個場次（包含主題演講）進行討論。連同主持人，參與的學者總共有三十八人，分別來自香港、澳門、臺灣和中國大陸，其他旁聽的學者、學生及社會相關人士亦甚踴躍。從整體來看，這是一次極成功的學術盛會。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林慶彰教授，親自組織並率領了以中研院文哲所經學組為主體的臺灣經學研究團隊與會。會後，政治大學中文系車行健教授與文哲所蔣秋華教授商議，擬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中策劃香港經學研究專輯，此亦林慶彰教授多年來率領研究團隊參與大型學術活動後之慣例。為使此次會議的活動內容為更多人知曉，特撰此文以應專輯之需，一則以廣周知，二則以備查考。惟事後追記，難還原貌，倘有疏漏誤記之處，尚祈大雅君子不吝指正。

本文寫作曾獲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班盧啟聰同學協助，特誌於此，以申謝悃。

* 吳儀鳳，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二、第一天議程：五月六日（週三）

上午九點在浸會大學逸夫校園逸夫行政樓五樓（SWT 501 室）舉行開幕儀式，由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羅德恪 (Prof. Douglas Robinson) 教授致詞，表示對此次會議之重視，並歡迎與會嘉賓來到香港，他更指出：香港經學研究的研討會在香港舉辦，具有特殊的意義。接著由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系主任盧鳴東教授致詞，盧主任提到：二〇〇九年，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曾經合辦過香港首次經學學術研討會¹；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則在二〇一〇年舉辦過「二〇一〇中日韓經學研究研討會」。香港經學的研究意識逐漸開啟，乃由於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林慶彰教授的帶領和推動，此後也分別在香港嶺南大學舉辦過香港經學的相關研討會。目前盧鳴東教授也正與林慶彰教授合作，預計將要編纂一部《香港經學研究論著目錄》。

（一）主題演講

在開幕式後，接著是主題演講，由三位嘉賓擔任主題演講，三位嘉賓分別是來自臺灣中央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林慶彰教授和香港能仁專上學院的單周堯教授，及新亞研究所的李學銘教授。主題演講由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壽安教授主持，演講內容分述如下：

林慶彰教授在〈香港經學文獻的檢索和利用〉提及，「香港經學」是近年流行起來的研究意識，雖然它的內涵仍有待進一步討論，不過，大體上可從三個條件來辨識、檢索、利用從屬於「香港經學」的研究成果：（一）在香港長期任教或做研究的學者，在各地所發表的研究成果。（二）某一時段在香港從事教學或研究，此一時段的教學或研究的成果。（三）香港留學生在世界各地獲得學位之學位論文。因之，林教授分從六個項目討論當前所能檢索和利用了「香港經學」研究文獻，包括「經學綜論」、「傳記資料」、「經學專著」、「期刊論文」、「學位論文」、「論文集論文」等。林教授指出，目前各方面的著作和檢索工具都仍有待加強，其中尤其以編寫香港經學的入門著作和編輯、出版相關傳記資料、研究目錄為急。以便指引

¹ 此次會議報導見蕭欣浩：〈「經學之傳承與開拓」國際學術會議報導〉，《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5卷第1期（2015年3月），頁151-162。

學者較快地進入此一研究領域，打好香港經學的研究基礎，也為未來的研究提供殷實的條件。

單周堯教授發表〈香港有關《春秋》「五情」之研究〉。該文介紹單教授近年來對《春秋》「五情」問題的研究，並就相關論文之主旨舉其大要，以示研究成果。首先，〈錢鍾書《管錐編》杜預〈春秋序〉札記管窺〉藉錢氏以一般史學觀點討論「五情」問題，似未得《春秋》要旨。進而，〈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五情說補識〉先就杜預〈春秋序〉以「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論定「五情」為綱，深化並推述其旨。指出五情所重，本在經學；然觸類引申，論定《春秋》「五情」問題，自杜預而下，已漸轉移為著重其詩學內涵，以作為論詩品詩之權衡。因之，〈論《春秋》「五情」——兼論「五情」與詩學之關係〉又分別就楊萬里、錢鍾書、張高評、竹添光鴻等以詩學詮釋「五情」的觀點，論其得失。又於〈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論五情說管窺〉文中，述評竹添光鴻之「五情」說，認為其說異於杜預者，多有待斟酌。最後，〈「五情」之相關問題〉回歸杜預〈春秋序〉以為「五體」與「五情」互見的觀點，而後孔穎達遂有「五例」之稱，後人從之者甚夥。然考其源，則孔氏所稱者，無非是要強調孔子之修《春秋》，「為例之情有五」（即情意有五），至易「五情」為「五例」，猶言「為例之例有五」。由此可知，「五情」之性質，當屬經學，而不在史學、詩學。

李學銘教授發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經史關係與經學研究在香港的思考〉。該文以章學誠《文史通義》「六經皆史」一語為嚆矢，談論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經史關係，舉出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及《竹書紀年》等各種史書與經學的關係，並從古代學術發展的角度，討論魏晉以後經史的分合、宋明時代的「附經言事」，以及清代顧炎武、錢大昕、柯劭忞諸學者藉經以言時事，即所謂「以古通今」或「借古論今」的論述。從文中李教授導出，中國傳統文化實有經史同源、研治經史不能脫離時代關懷的學術精神。通過這種認識，吾人實不必將傳統的經學、史學精神貶抑為封建思想，而應化舊為新，發掘經、史之學中亙古常新的內涵。

開幕式和主題演講後，進入正式的研討會。會議共分為六個場次，第一、二、三場為第一天，在香港浸會大學逸夫校園逸夫行政樓五樓舉辦。第四、五、六場於第二天，在新亞中學內禮堂舉辦。每一場次約有四至五篇論文發表。

（二）第一場小組討論（共五篇，由香港恒生管理學院中文系張光裕教授主持）

首先，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何志華教授發表〈香港中文大學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經學研究回顧〉。該文介紹香港中文大學劉殿爵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歷年來整理、研究傳世古籍的出版成果。按其出版領域，分別有「古籍逐字索引」（已出版八十四種，所有文字經重新標點、校勘、按全書字頻數次序列出全書單字及其拼音）、「先秦兩漢古籍引經」（已出版七種，為全面蒐集先秦兩漢文獻引錄《十三經》所有文例，比勘版本，記錄異同）、「互見文獻」（已出版五種，利用資料庫收集先秦兩漢所引典籍的互見文獻，全面歸納、分析先秦兩漢傳世文獻相互傳承的情況）、「類書引古籍」（已出版七種，對比唐宋類書引錄最多的幾種文獻，以句列並排的方式對比相同的文獻資料，蒐集有見於唐宋類書的今本文獻之異文）、「專書詞彙」（已出版八種，全面蒐集、整理先秦兩漢的詞彙資料庫，以開拓詞彙研究的數據）、「古籍專著」（以該中心成員的經學研究成果，收錄成書，已結集成四部專著）。

接著，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許振興教授發表〈香港大學與香港經學——創校首三十年經學課程的啟示〉。許文以港大創校首三十年（1912年至1941年）經學課程的沿革為討論範圍，分作三個時期，即文學院時期的經學課程（1913-1926）、中文學院時期的經學課程（1927-1932）、中文系時期的經學課程（1933-1941）。檢討經學知識的講授，如何在歷經課程改革、西方學科分類方法和「實用」主導的辦學宗旨等衝擊底下，逐步從大學課程裏消失。歸根究柢，此現象實緣於西方學校教育制度與學科分類方法，已令經學失卻生存的土壤。香港大學既已被確定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有志入讀者自會重點提升個人的英語水平，中文則被等閒看待，而以中文為研習媒介的經學更是學生的陌路人。在「實用」主導的辦學宗旨引領下，從文學院與中文學院時期的賴際熙，到中文系時期的林棟與許地山，他們或出身翰林、或遊學海外，雖然對港大的經學課程改革用心著意，而其中舉步維艱的經歷亦是有目共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金培懿教授發表〈港大「中國經學」課程之退場——一個東亞視域的考察〉。該文從一個相對廣域的東亞視野來考察一九三四年以還，始於胡適，歷經陳受頤、容肇祖，完成於許地山的港大中文學系改革事業之原委、發展經過、造成之結果及其可能意涵。主力討論兩大議題，一是將港大中文學系之

改革，視為中國新文化浪潮、文學革命之一環，重新分析胡適主持其事之性質為何？二是將港大中文學系改革之兩大結果（即區分中國文史學系為「哲學」、「史學」、「文學」、「普通文學」四部；以及「經學」自港大中文教育退場），置於東亞之近代新式大學課程如何編派舊學的發展脈絡中，以思考其間展現出的共相。本文藉由此一考察，做出推測，認為港大中國文史學系「中國經學」課程的退場，確實存在著隱而不宣的「日本因素」。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區志堅教授發表〈經學知識的傳播：以香港學海書樓為例〉。該文分從以學海書樓之主講為「經」，由書樓創辦、早期發展，到港大中文學院成立，三十年代至今學海書樓普及經學知識的工作為「緯」，研究學海書樓歷年來的學人，藉舉辦學術講座及籌辦公共圖書館，使中國傳統文化及經學知識普及民間的發展。通過相關檔案及口述歷史，訪問賴際熙後人賴恬昌教授，及前金文泰中學李瑞華校長，並得其惠贈有關文獻，得見學海書樓的發展。特別指出，前清翰林群體移居香港，保存國學、融貫新知，推動、傳播中國文化及經學知識的志趣、抱負和實績。

香港中文大學國學中心鄧立光教授發表〈香港本地經學教育的思考〉。鄧立光教授此文從「國學」一詞開始，說到儒家的重要性，接著則說明香港的正規教育不重視中文。鄧教授認為，要推動香港本地的經學教育，不應止於一種做法，也不宜局限在社會上的某個層級。因此，鄧教授即提出多項可以落實香港經學教育的做法。從學術層次而言，包括大專院校定期舉辦經學研討會、國學講座，開設經學概論等通識學分課程，並以大學的國學中心為始，聯結在地民間院校，設推廣課程，並在中學教育加強中文課的內涵，中學以下則開設童蒙課程。其次，則從課外活動項目著手，推動復禮運動，講授生活禮儀、與民間文化教育或宗教團體合作，舉辦諸如國學夏令營、生命成長營、禪修班等，以及推廣習武，以領會中華武德。

（三）第二場小組討論（共五篇，由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陳致教授主持）

香港新亞研究所何廣棧教授發表〈恭述錢賓四先生《論語》之研究與著述〉。該文以目錄著錄之法整理錢穆的《論語》著作，乃因《論語》實為錢氏用力最勤、用時最久，研究成果最為富贍之經籍。職是，本篇細論錢先生自述研治《論語》之情事，及錢先生研治《論語》而撰成之專書，包括《論語文解》、《論語要略》、《論語新解》與《孔子與論語》，及《孔子與論語》中闕收之《論語》單篇論文，

凡五篇。綜言之，錢氏治《論語》，就其撰作次序言，可分作三大階級：始則鑽研《論語》語法、修辭；次則以義理、訓詁、考據研治之；最後則注重講授《論語》之讀法。由此可見，錢氏雖以史家著名，然其思想上所尊崇者始終為孔子，其所欲效法孔子者，乃因孔子為教育家。故錢氏晚年勸人讀《論語》，乃欲從中學習做人之道，並貴能實踐貫徹，而不是從孔子《春秋》立志為一史學家。

澳門大學中文系鄧國光教授發表〈香港早期經學議題的反思與專論：區大典《論語通義》義理要詮〉。鄧文謂：「討論香港學術，不能離開香港大學與新亞書院這兩大學術建制的氣脈。前者自身是典型的西式大學，而後者則屬書院的傳統，體現了東西方教育體系中的遺傳因子。本文焦點放在學術建制中之『經學』，觀照其生發的原點，從而彰顯其『雖無文王猶興』的原生本色。以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創始人物之一的區大典《論語通義》與新亞書院及研究所創始者錢穆《論語新解》為考察對象，在經學義理所繫的《論語》學上的造詣為切入點，便可以具體顯示香港經學兩脈的共鳴，並了解其如何在北鄙殺伐之聲充斥的學術語境之中，能夠不為俗尚披靡的精神強度與學理高度。區大典《論語通義》，這部《論語》著述向來未經人道，本文首先介紹及研究，從而揭示久埋於無知與偏見下的經學真髓，開顯華夏學術在香港所能發揮的魅力，說明這份極為珍貴的學術成果，必須實事求是對待而善加珍惜。若全面理解香港《論語》學的關鍵，必待兩先生之著述獲得全面的理解與研究。」

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張曉生教授發表〈錢賓四先生論姚際恆〉（論文有繳交，未出席）。此文以姚際恆的學術為主，從錢賓四先生對姚際恆的論述入手做觀察。第一節前言中，談到民國時期學人對姚際恆的關注，其中最主要者是顧頡剛，而錢穆先生對姚際恆的研究當也受到顧頡剛的影響。第二節敘述錢賓四先生論姚際恆的學術特質，分別有：（一）長於辨偽；（二）解經不論漢宋；（三）姚際恆與當時學者的異同。作者申述姚際恆用釜底抽薪的方式將理學思想的重要論據《易傳》、《大學》、《中庸》全部列為偽經，以最激烈的手段將經典的文本問題與義理問題一併解決，姚氏這種辨偽意識，是與閻若璩、毛奇齡最明顯的不同。第三節為錢賓四先生論姚際恆的學術淵源，認為陳確、潘平格與姚際恆為王學流變之一派。第四節結語，討論姚際恆在民國初年的學術界曾經發生過特殊的影響，受到不同程度的崇拜或批評，但是對其學術全貌及學術史細節問題，並未得到認真的對待。錢穆先生建構全體辨偽之學，比較閻若璩、毛奇齡、姚際恆三人的學術異同，並找到

其與時代的共同思想之脈動，是很細緻的學術史觀察。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楊晉龍教授發表〈饒選堂先生與臺灣的學術研究——香港在地學者對臺灣學術的影響初探〉（論文有繳交，未出席）。此文探討香港學者對臺灣學術的影響與貢獻，因而以饒宗頤先生為代表，藉由外部研究的歷史分析法，透過臺灣的研究生學位論文參引饒宗頤論著的表現，說明饒宗頤對臺灣學術的影響狀況，以提供相關研究者參考。經由二〇一三年之前八八一篇參考引用饒宗頤論著學位論文的表現，瞭解他在文字學、詞學、藝術等三大領域，對臺灣的研究生有非常明顯的影響及貢獻；且其影響的範圍除文、史、哲等相關學門外，還涉及政治、管理、藝術、建築與地理等學門，這也就是饒宗頤對臺灣學術影響貢獻的實情。研究所得成果除提供相關研究者比較實際的答案外，同時對於探討香港學術傳播交流者，以及探討饒宗頤之實際學術貢獻者，均有實際的協助功能，這也就是本文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擔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的魏綵瑩女士發表〈錢穆的《尚書》學析論〉。該文謂古史辨時代，《尚書》學的討論是一個重要的焦點，活躍於此一時期的錢穆，在其各類著作中也有不少針對《尚書》的詮釋。因之，該文爬梳錢穆《尚書》學研究文獻，整理錢氏《尚書》學的重點。首先，是錢氏對閻若璩及其辨偽成果的評論，為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做了定調性的認同與肯定。錢穆論《尚書》今古文問題，反映了他對考據學態度的不滿，他論學極重視志向氣度宏偉與否，以及立身出處的態度如何，往往以此評論學者與學術的高下。其次，推尊胡渭的《禹貢錐指》，認為《禹貢錐指》與《春秋大事表》在錢穆眼中都是「通學」，格局是遠遠超越「專家之學」。第三，從文體辨《今文尚書》各篇的真偽，錢穆以記言的體例純粹與否，判斷《今文尚書》各篇的年代真偽：論《周書》，則稍疑或認定〈洪範〉、〈微子之命〉、〈顧命〉、〈費誓〉、〈秦誓〉為偽造；論《虞書》、《夏書》、《商書》，則以〈堯典〉官制推測是戰國晚出的追記之辭，為當時人心中理想政府的投射，其他如〈皋陶謨〉、〈益稷〉也顯為後人偽託；至〈禹貢〉、〈甘誓〉，則體製已然略近於《史記》，不可能為早期史料；至〈湯誓〉、〈盤庚〉等，亦是後人所作，非如《周書》為當下史臣的記錄。綜言之，錢穆於《尚書》主要是從宋學的角度出發，著重「崇尚博通」的意義，認為晚清以來今古文之辨，無用於時。所以錢穆推尊周公在傳統文化中的價值與意義的地位，一是制禮作樂，二是人文的天命觀或歷史觀。此反映出錢穆「通經致用」的治學精神，他認為

治學要有益當下的世道人心。幫助人們促進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即符合這樣的精神。他論《尚書》特別推崇周公，便是此種理念的發揮。

（四）第三場小組討論（共五篇，由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鄭吉雄教授主持）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李金強教授發表〈徐復觀及其《中國經學史的基礎》〉。本文前言因述及香港經學之發展，故特錄於此：「香港自一八四二年開埠以來，遂成中西文化交流之大都會。其中基督教以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傳教士理雅各 (Jasmes Legge, 1815-1897)，自馬六甲來港開教，於宣教之餘得王韜 (1828-1897) 之助，英譯四書五經，為香港經學研究之濫觴。時至辛亥革命，滿清遺老如陳伯陶 (1855-1930)、賴際熙 (1865-1937)、區大原 (1869-1945)、區大典 (1877-1937)、溫肅 (1879-1939) 等，相繼南下香港。其中賴際熙於一九二三年創立學海書樓，邀請前述遺老，講授經史。賴際熙與區大典又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任教，編寫經史講義，傳統經學，遂得植根香江。及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國內士、商南移香江，其中錢穆 (1895-1990)、唐君毅 (1909-1978)、張丕介 (1905-1970) 創辦新亞書院，宣揚傳統中國文化。徐復觀 (1904-1982)、牟宗三 (1909-1995) 亦相繼由臺來港加入，是為新儒家至本港講論儒學，發揚傳統中國文化生命力的『重要時刻』。經學由是發皇於香港。其中徐復觀於新亞書院及研究所講學，並於一九八二年臨終前夕，出版《中國經學史的基礎》一書，揭橥經學史研究的新義，尤具意義。故就此探究，為當代香港經學研究提供一新案例。」論文次則詳述徐復觀先生之生平，「由於國共內戰，國民黨兵敗。至一九四八年徐氏漸對政治現實失望，已謀脫離」。除國共內戰外，主要於四十四歲時得讀大儒熊十力 (1885-1968) 之《新唯識論》，繼而獲見於重慶北碚金剛碑勉仁書院。該院為梁漱溟 (1893-1988) 創辦，徐與熊氏面談，為其主張治學、講學乃造成風氣以救國之理念所感染，遂有志於中國學術之研究。在東海大學中文系任教後，一九六九年由於文化立場與教會大學之基督教信仰有別，被迫退休，遂離臺赴港，臨行時以呂晚村「無慚尺布裹頭歸」，表明其捍衛及發揚中國文化的夙志與風骨。翌年，至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及研究所任教，香港遂成為其晚年學術歸宿之地，與任教新亞之唐君毅、牟宗三等二人，一同被譽為海外新儒家鼎足而三的大思想家。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蔣秋華教授發表〈劉百閔抗日說的《公羊》論

述)。蔣文謂：「劉百閔早年受過傳統學術的薰陶，後來又到日本留學，可說是學通中西的學者。日本侵華期間，以學者身分，經常撰文宣導抵禦外侮。晚年移居香港，任教於香港大學，專心於教學與著述。觀其一生行誼，雖偶而涉及政治，但終以學術文化事業為主，尤其在對抗日本攻擊中國之時，以其文筆，呼籲國人團結振作，共禦外患。本文即試以其於民國二十一、二年間，所撰宣導抗日之文章，析論其意旨。」論文中舉〈榆關失守與祖宗家法〉一文，言：「劉百閔從榆關失守說起，力斥沒有奮力抵抗的將領，並抬出所謂『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祖宗家法，用以整飭不能盡力衛國者。」又舉劉百閔〈殺倭與公羊——祖宗家法論之二〉，借用《公羊傳》的理論，闡釋《春秋》所寓的祖宗家法，即攘夷、復仇、尚恥，三者環環相扣，密不可分；而總歸一句，便是殺倭／抗日。這是在國勢危急的狀況下，他的大聲呼籲，無非想要喚醒抵抗的意志，以守土衛國；面對的聽者，不只是軍中的將士，更是全體的國人。劉百閔藉《公羊》家說，闡釋當前岌岌可危的境遇，正如同春秋時期中原遭受夷狄的侵凌，所以孔子作《春秋》，目的就在將他們攘除。因此，他從中拈出攘夷、復仇、尚恥，要國人深明其意，有所覺悟，全力抗日，以救亡圖存。此一方式，乃藉經義發揮，可知其詳熟傳統經典，因而可以運用自如，亦可見經學的流傳，綿延不絕，仍有其不可忽視的作用。

國立嘉義大學中文系馮曉庭教授發表〈劉百閔先生經說探微〉。劉百閔(1898-1969)，浙江黃巖人，一九四九年由廣州移居香港，與錢穆、張丕介、唐君毅等共同籌建新亞書院的前身亞洲文商學院。一九五二年遷居臺灣，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七年再應港大中文系禮聘，赴港任教。劉先生先後在香港高等院校任教十八載，其經學相關專著，亦均先後梓刊於香港。因之，本文首先簡述劉先生的經學專著，包括《經學通論》、《經子肆言》、《易事理學序論》、《周易事理通義》及《孔門五論》。另外，又就劉先生「經學五書」中若干觀點，進行分析、述其梗概，以彰顯劉先生學說於經學研究活動的價值：(一)申論「六經皆事」。此說奪胎於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先取章氏「六經皆先王之政典」的判斷，又特別區隔《周易》為「知來」，餘《五經》為「藏往」，認為藏往者可稱史，而知來者亦稱為史，則絕無道理。(二)因之，劉先生即頗著力於構築「《周易》事理學」。其論《五經》所言為事，以為「言事則理在其中」；《周易》所言為理，以為「言理則事亦賅焉」。前者「由顯以之隱」，後者「由隱以之顯」，兩者一體兩面，互為導引，所以《周易》所載述者，即為《五經》原理，《五經》既為言事，則《周易》當可稱作「事

理學」。(三)解析《春秋》「公報」性質。另闢蹊徑，直接認為所謂「史」，即於已成之事載錄完備；所謂「報」，即於事件之最新訊息有所揭露。故劉先生言《春秋》不是史而是報，乃專門針對《春秋》最初性質而言，並非否定《春秋》為史的既定事實。

福建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簡逸光教授發表〈劉百閔《經學通論》探析〉。簡文謂：「劉百閔先生與香港經學的淵源，乃其晚年有近十五年任教於香港。其著作有《經子肄言》、《易事理學序論》、《周易事理通義》等，皆生前刊行。而《經學通論》一書，依錢穆言，為港大授課講義，身後由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任國防研究院主任時，囑國防研究院出版部為之付梓。此書篇幅有八百頁，採分論主題來通貫經學。書中體式、構思，乃至援引中西材料對比，皆不同於一般經學通論之體例。論文提出劉百閔《經學通論》一書，歷經清末民初國學、國故，中西體用思潮後的反思，具有客觀詳審的經學源流觀念，更有具思辨性的主觀學術論點，並且運用中西會通方式來彰顯經學中的概念。這些特色，在當時學術思潮底下，乃至同時代以『經學通論』為名的專著，可謂旁秀芝蘭，與眾不同，值得後人深入探究。」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宗靜航教授發表〈徐復觀先生「《周官》為王莽劉歆偽作說」淺議〉。文中說道：「現代學者在研究古代官制，特別是金文中的官制時，多會利用《周官》。不過，從學者的研究成果來看，並沒有發現《周官》是偽書的痕跡，反而認為應該重視《周官》的官制資料。」文末則引用余英時先生的話，說明徐復觀先生論《周禮》是王莽劉歆偽作，是從極權主義的角度來理解《周禮》中政治社會的設計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因為這象徵著中國現代知識人的澈悟和轉向。所以，「『五四』時代雖然已經沒有人相信《周禮》可以『治國、平天下』了，但是根據一種理想的設計全面改造社會——即『聖人制作』——的傳統觀念則仍然保留在許多知識人的思想習慣之中。……百年以來，烏托邦的追求在中國不僅深入人心而且迫不及待」。然而，對「烏托邦」、「理想國」的追求，「其中有極權主義的傾向」。徐復觀先生的微言大義的確是有感而發，透露了重要的時代消息。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三、第二天議程：五月七日（週四）

（一）第四場小組討論（共五篇，由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周國正教授主持）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邱惠芬教授發表〈香港近六十年詩經名物研究述評〉。此文考察香港近六十年來的《詩經》名物研究，相較臺灣及中國學者強調《詩經》名物意象的研究，顯然更多關注於《詩經》名物的制度文化探索，如：以民俗學論《詩經》名物之增殖文化的陳炳良先生；或借用民族音樂學理論，闡述《詩經》分類的陳致先生；或承傳統經注互證方式，以論列《詩經》婚期正時的盧鳴東先生等；又有如香港大學吳長和先生博物稽古的《詩經服飾資料通詮》與《詩經飲食資料通詮》等論著。此篇論文試以宏觀角度述評以上數家在《詩經》名物研究的成果，並與中國及臺灣的名物研究合觀，以見香港《詩經》名物研究的發展情形。全文分為七節，分別為：一、前言；二、《詩經》名物界說；三、吳長和：《詩經》服飾、飲食資料通詮；四、盧鳴東：鄭玄「仲春婚期」的易學根據；五、陳炳良：《詩經》的增殖儀式；六、陳致：從禮儀化到世俗化的《詩經》；七、結論。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鄧佩玲教授發表〈讀潘重規先生敦煌 P. 2669《毛詩詁訓傳》殘卷敘錄札記〉。潘重規(1908-2003)上世紀五〇至七〇年代曾經任教於香港新亞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一九七三年榮退後定居臺灣。潘先生分別於一九六七年及一九六九年兩遊巴黎、倫敦，曾盡讀兩地所藏敦煌《詩經》卷子，其後發表一系列敦煌《詩經》卷子之研究文獻，並於一九七〇年由新亞研究所結集成《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出版。本論文以潘先生一九六八年發表於《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十期的〈敦煌《毛詩詁訓傳》殘卷題記〉為討論對象，就敦煌 P. 2669《毛詩詁訓傳》殘卷的鈔手、分部及校勘等問題，舉出其中六條，逐一分析，並就潘先生論文未詳盡處，加以延伸、討論。綜言之，潘先生於敦煌《詩經》學的成就，誠如許建平所言，有「公布寫卷，推進研究」、「介紹詳盡，定名正確」、「校勘精審，考覈至慎」及「辨訛正誤，考訂詳明」四方面，可謂公允妥當，中肯切要。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中文系謝向榮教授發表〈陳湛銓先生易學研究述略〉。陳湛銓先生(1916-1986)為香港國學大師，曾先後任教於香港及大陸多所大專院校，並

向公眾講學達數十年之久，桃李滿門。陳先生學問淵博，著作宏豐，惟大多以講義形式發行，未能廣為流傳，亦未引起應有重視，殊為可惜。此外，目前學界對於先生之評論，似以其詩學研究為主。然而，陳先生深於《易》理，平生治學大抵皆以《周易》為本。其治《易》，博采諸家眾說，出入四部三學，兼容並蓄，欲貫通「文辭」、「義理」、「象數」、「占筮」四學，又以〈乾〉、〈坤〉為綱，尤重〈乾〉卦義理，為人負氣仗義，篤守陽剛正道。文末並就所見，分類編訂先生之著作目錄，以及目前所見之相關評論，務求宏觀先生之治學精神、涵養與其《易》學思想，冀能揚其清芬，收到拋磚引玉之效。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許景昭教授發表〈《懷冰室經學論集》述要〉。王韶生(1904-1998)，字懷冰，於清光緒三十年(1904)九月二十五日誕生於韶州府曲江縣，世居廣東省豐順縣環清鄉桂林樓，後遷瑞林壩。其治學，始於母氏之教。一九二六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追隨經學大師吳承仕、史學大師楊樹達、《選》學大師高步瀛、詩學大師黃晦聞及詞學大師劉毓盤等受業。一九三〇年遠赴星洲，任端蒙學校校長，其後歷任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廣州大學、國民大學、文理學院等校文學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一九四九年，王教授遷港，歷任廣大、廣僑等書院，爾後受聘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迄一九七一年七月榮休。同年九月，王教授出任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專任教授，迄一九八九年七月，時年八十六歲。《懷冰室經學論集》，於一九八一年由香港志文出版社發行，收錄王教授十四篇有關經學研究的論文。許文摘錄王教授各篇論文之重點，並於文末做出王教授治學風格的五點總結，包括：一、博學詳說；二、論述持平；三、資料詳實；四、駁難補足；五、綜合整理。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黃梓勇教授發表〈徐復觀經學史研究述評〉。徐復觀的經學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中國經學史的基礎》一書。此著由〈先漢經學的形成〉、〈西漢經學史〉兩文構成，另有附錄〈有關《春秋左氏傳》的補充材料〉，實則為《兩漢思想史》卷三〈原史〉一文的節錄。因之，該文分別述評〈先漢經學的形成〉對周公、孔子在經學形成中的作用，以及〈西漢經學史〉中對「經學思想」此概念的構想。指出徐氏一方面認為經學淵源自周公作《詩》、《書》類文獻以明教戒。另一方面，又強調孔子奠定經學的基礎，形式則至荀子時才穩定，似有將經書的形成與經學的形成混為一談。至於西漢經學的部分，則以大篇幅廓清西漢經學的傳承問題，並提出「經學思想」的說法，只是這個概念在徐文中甚

為模糊。黃教授認為，雖然徐氏並未寫成一部完整的經學史，但吾人當肯定他對經學史研究種種嘗試的價值，例如他於〈先漢經學的形成〉中嘗試調和傳統經學起源的說法；又如他在〈西漢經學史〉中提出當注意經學思想的研究。經學史到底包括什麼內容及形式，迄今仍未有很好的解決方法。徐氏對於經學史的寫作方式，當然並不能盡如人意，但的確產生了影響，如姜廣輝編訂《中國經學思想史》，便直接受徐氏經學思想研究的啟發。

（二）第五場小組討論（共四篇，由香港新亞研究所李學銘教授主持）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郭鵬飛教授及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許子濱教授聯合發表〈蘇文擢先生禮學遺稿輯論（一）——〈追享朝享申先鄭義〉、〈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解〉〉。蘇文擢先生(1921-1997)博學深醇，既是一代辭章家，也是一代鴻儒。蘇公執教上庠數十年，教授經、子、詩詞、古文、書法等科目，嘉惠士林，澤被後學，對香港經學貢獻甚大。其學初作於義理、考據、詞章之間，於六藝鑽研至深，尤長於《三禮》與《左氏》、《公羊》學。本文作者於二十年前，蒙香港單周堯教授見示蘇公經詁寫本十餘條，即行複印，保存至今。蘇公這部分《三禮》經詁，採用傳統條目札記體式，無不針對《三禮》文本的疑難處，廣綜舊帙，參酌群言，推尋研覈，斷以己意。其識見之卓著，論證之謹嚴，並不遜色於乾嘉學人。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車行健教授發表〈顧門中的勵耘弟子——牟潤孫經史之學的面向及其所反映的師承關係〉。牟潤孫(1908-1988)，原名傳楷，字潤孫，後以字行。生於北京，祖籍山東省福山縣。一九二九年考入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一九三二年畢業。指導老師為陳垣及顧頡剛，復從柯劭忞受經史之學。牟潤孫的學問主要表現在經學與史學兩方面，其經學傳承自柯紹忞，史學則主要師承於柯劭忞與陳垣。柯紹忞和陳垣對其學術具有最直接、最重要的搏塑力量。牟潤孫生前曾有所謂「南來之學」之說，其南來之學的概念，雖然主要指的是將陳垣的學術傳播至南方，但也包括其終生禮敬，於師承淵源未嘗一日或忘的柯劭忞，所謂「蓼園之學也南來」。唯獨其與顧頡剛的關係頗令人好奇，從現今留存的相關記述中，似可看到二人間時有不諧甚或齟齬緊張的狀況，牟潤孫後來甚至疏離顧門，完全投入陳垣勵耘書屋門下。本文先從分析牟潤孫經、史兼具的學術面向及其學術淵源入手，再進一步深入探討牟氏與陳垣和顧頡剛之間微妙的師門關係與學術關聯。從一開始

的學問不契，再加上個性的不同與做事態度的差異，最終發展至二人師生關係的不諧，因而使牟潤孫陷入「身在顧門，心在勵耘書屋」的尷尬處境，甚至形同「破顧門」、「入陳室」的情況。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經學研究所吳仰湘教授發表〈牟潤孫先生的經學史研究述評〉。吳文謂牟潤孫先生博通經史，在海內外享有盛譽，可惜學界往往強調他的史學而忽略他的經學。本文先勾勒牟潤孫先生一生與經學的機緣，再撮述他研治經學史的重要成績，最後對他晚年提出「經史合一的史學」論加以闡述，希望能對他的經史之學有更加深切的認識。牟潤孫先生經學深有造詣，不僅對《論語》、《大學》、《公羊傳》等經書的文句與義蘊有獨到的解說，也對漢魏以來的經學變遷做了別致的探討；其各種具體研究成果引人矚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高懸經世致用的旗幟，根據經史同源的原理，做出「經學皆史學」的論斷，再反思兩漢以來經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經史合一的史學」說，堪稱晚年定論。他在學術臻於精熟之際，針對現代中國經學消亡、史學西化，力矯時弊，從經學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國古代經史合一的優良傳統，期望恢復「經史合一的史學」，融經學入史學，為中國現代史學發展指出了一條正確的方向。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鄭健行教授發表〈記牟潤孫老師「中國經學史」課〉。鄭教授以回憶的方式記述牟潤孫老師的「中國經學史」課。一九六〇年九月，鄭教授在新亞書院中文系升讀三年級，選讀牟潤孫老師的「中國經學史」課程，此為一門學年課程。五十多年過去，學生時代各科聽講筆記，散失殆盡，只有牟老師的經學史筆記完整保留下來。因之，該文即整理當時的講課筆記，其主要內容，包括簡短的緒論，另有七章：一、經的來源和經學的成立；二、漢儒經學的特點；三、兩漢學派家法之爭；四、經學玄學化的轉變；五、「新經學」概略；六、義疏之學的源流；七、唐代經學之「革命」。前六章是完整的章節，第七章只有開頭，還未完結。除此之外，該筆記另附牟潤孫老師對魏晉時期「新經學」之更詳細的討論：一、指認「新經學」的重要人物是王弼，其最大特點就是將漢人經學中迷信成分一掃而空。二、檢討王肅之學與鄭學的關係，兼及討論孫志祖《孔子家語疏證》對王肅偽作《孔子家語》的論證問題。

（三）第六場小組討論（共四篇，由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劉楚華教授主持）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李雄溪教授發表〈區大典《詩經講義》述評〉。《香港大學經學講義》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區大典授課的課本，過去關於區氏其人其著的研究並不多見，此《講義》目前亦已不大流通，而本文則考察《經學講義》中的《詩經講義》。大體而言，《講義》宗《序》立場十分明顯，復以《毛傳》、《鄭箋》、《孔疏》、《朱傳》為骨幹，加以評價和補充，特別注意詞義訓釋，評價注疏優劣，只是沒有重大的學術發現，也沒有十分獨到的見解，多是引錄前人注疏，略加評論，偶有感發，闡發詩意。李教授指出因其為課本，故不宜對它有嚴謹學術著作的要求。透過考察《詩經講義》，吾人可以知道殖民地時期的香港，區大典教授當時不為人重視的傳統經學，其傳薪之功，不能抹殺，同時也可窺見當時《詩經》傳授之一鱗半爪。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蔡長林教授發表〈亂世哀音——讀程兆熊《春秋講義》〉。該文略述當代新儒家之一員程兆熊先生的生平、治學規模。並介紹其《春秋講義》之作，以闡發《春秋》大義為主，就每一位魯國國君在位其間之史事，擇其重要而足以闡發者，列以標題，詳錄原文，參以三《傳》杜預、何休、范甯之解，再擇啖、陸、程、朱、胡安國之說為補充，間下個人之講疏，結論再做大義之闡發。程氏講《春秋》，以護持人道大防、讚揚禮義之行、堅守民族文化大義為要點，而以歸於性情之教為宗旨。所謂性情之教，實即性、情並舉，兩不偏至，從個人以至家國宇宙均能安頓平衡。雖然，其所言有時太過空泛，唐君毅亦曾指出「有時嫌太流走」，然其中不乏憂國憂時之論，每能發人深省。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曾聖益教授發表〈王韜《春秋》曆法簡議〉。該文指出，王韜以西方曆學考訂《春秋》曆法，認為《春秋》經傳曆法悖亂，主要原因在於《春秋》經傳所用曆法不同，各國所用曆法不同，且經文記載所用曆法，前後亦有不同。正是因為所用曆法不一，導致《春秋》時日乖訛。因之，王氏先以考索日至、建元為基礎，論列《春秋》三十六日食，指出其中合者僅十六，餘皆有所差繆，導致閏餘失次，日月乖違。從中，解釋了三《傳》於時、月、日之意義，為何皆不相同。大致而論，杜預不以記載日、月為義，《公》、《穀》則稱其具褒貶深義，得此認識，王氏顯然採持杜預義，以為古書時、月不具特別意義。總言之，王

氏以西方曆學考訂《春秋》曆法，不拘泥於經傳時、月、日，以論前人注釋之得失。其精審程度，為時人所贊，後人亦多徵引，用以編纂古代朔閏表，有裨益於上古史之研究。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盧鳴東教授發表〈《自由報》與莫可非的經學雜文〉。盧教授論文中一開始即言及：「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於二次大戰中宣布投降，隨即國共兩黨爆發內戰，觸發大批大陸人士出走海外。在這次移民潮中，有為數不少的知識分子經由中國南面抵達香港，有部分只是作短暫停留，後移居臺灣或海外；也有些旅居香港，留港發展直至終老。」其中，《自由報》便是南來學人在港英政府寬鬆自由的政策下辦報，致力傳授中華文化者。莫可非，與絕大多數南來知識分子一樣，是為了逃避國共戰禍而逃難來到香港。他在《自由報》的副刊專欄中，利用「曲齋」的筆名寫稿，直至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為止。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莫可非整理曾刊載在《自由人》和《自由報》中的各篇短文，付梓出版，書名命為《稊稗集》，收錄一六一篇短文，錢穆為其書寫序。莫可非自稱幼時「從塾師受古文」，又熟悉桐城派文論，遍讀章學誠《文史通義》，他捨棄六經作為「明道」的唯一工具，採用文章所載的「行事」來體現道的存在；又考察到行文「雅潔」是他對文章的基本要求，以及把儒家經典視為寫作文章最高指導的原因。經學在香港的滲透性和普及程度，不是一般量化工具所能衡量。

由於時間不足，最後一位發表人盧鳴東教授更受到時間的擠壓，被迫僅有十分鐘的時間發言。由於場地借用有時間限制，未能讓盧鳴東教授暢所欲言，是研討會的一點小遺憾！但這也顯示，研討會的參與人數眾多、討論十分熱烈的會議現象！

四、結 語

此次香港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研討會，會議論文共計三十一篇，討論到的學者包括：錢穆（3篇）、徐復觀（3篇）、牟潤孫（3篇）、劉百閔（3篇）、區大典（2篇）、王韜（1篇）、潘重規（1篇）、陳湛銓（1篇）、蘇文擢（1篇）、王韶生（懷冰室，1篇）、程兆熊（1篇）、莫可非（1篇）及饒宗頤（1篇）。其中，劉百閔、陳湛銓、蘇文擢、王韶生和莫可非都是學界以往關注較少的。透過此次研討會的召開，相信這些學者的學術成就和相關經學論著，將會受到學界更多的重視。此外，關於學校及機構的討論，則包括香港學海書樓（1篇）、香港大學（2篇）、香

港中文大學劉殿爵古籍研究中心（1篇）。又有涉及香港整體經學教育與文化的議題（2篇）和研究現況的評述與省察（3篇），亦顯示了研究的多樣化與對現實的關懷。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期待這次香港經學研討會的舉辦，能為香港經學注入更多的源頭活水，使得香港經學持續地朝向更加精進、廣博的方向茁壯與發展。或許在不久的將來，能再陸續召開更多以香港經學為範疇的優質學術研討會。

